第四届中国·琉球历史关系研讨会综述

邹爱莲　刘兰青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日本冲绳县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琉球历史关系研讨会”，于1997年10月2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邢永福、日本冲绳县历代宝案编集委员会副委员长、琉球大学教授金城正笃先生分别率中、日学术代表团出席会议。参加本届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来自中日两国研究中琉关系史及与其相关的部门，日本方面有：日本冲绳县公文书馆、冲绳县立博物馆、琉球大学、神户女学院大学、冲绳县立艺术大学、九州大学；中国方面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报社、《中国档案》杂志社、北京市档案馆(局)、首都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与会专家学者总计49人。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刘余才主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邢永福致开幕词。日本冲绳县历代宝案编集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城正笃代读了冲绳县教育委员会教育长安室肇给大会的致词，对本届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届研讨会上共有7位学者提交学术论文并做了大会发言，他们分别从政治外交、册封朝贡、难船贸易等方面，探讨了中琉历史关系中的某些问题，披露了新近发现的有关清代中琉关系的满汉文档案，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学术观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秦国经在《乾隆时代的中琉关系》一文中从政治关系、封贡贸易、文化交流、海难互救四个方面，论述了“乾隆盛世”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对中琉关系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通对档案史料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乾隆时期封贡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中琉政治关系更为稳定和密切。同时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得到全面和深入的发展，贸易额和易货品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中国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琉球，琉球王国出现了兴学讲儒的高潮。因此，乾隆时代，是中琉关系史中最辉煌的时期。

日本冲绳县历代宝案编集委员会委员、前冲绳县立博物馆馆长系数兼治先生所撰《论册封使齐鲲》一文，通过对册封使齐鲲奉旨赴琉进行册封活动、琉球遣使迎接并遇海难等一系列史实的认真分析，探寻封贡活动的内在动因，明确提出，尽管在海禁政策下，封贡贸易是唯一合法的贸易方式，但封贡活动绝非仅仅出自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华夷君臣、统治伦理的贯彻执行，最重要的是政治意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朱淑媛的论文题目是《清代琉球国的朝贡与表奏文书》，她依据琉球国王的表奏文书等档案史料，从诸多视角阐述了清代二百多年间，中琉以封贡为轴心，以表奏文书为联系纽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日本冲绳县历代宝案编集委员会委员、神户女学院大学教授真荣平房昭先生则以《鸦片战争前后的东亚国际关系和琉球》为题发言。他以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鸦片战争前后东亚国际关系为背景，论述了在时代转换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中，通过琉球渠道海外情报的传播和福州贸

易动向等问题，不仅阐明了当时的历史情况，也说明了琉球在当时东亚所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成崇德教授的评价颇为中肯，他指出：以往对中琉关系的研究，多注重于清代鼎盛时期的册封和朝贡等，或注重于 1871 年以后中日之间关于琉球国地位的外交纷争，而忽视了 19 世纪初至中叶琉球与中国关系的研究。真荣平房昭先生的文章正是对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和中琉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观点颇有新意，并且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邹爱莲与馆员高换婷合作撰写的《钦使赵文楷李鼎元赴琉册封活动简析》一文，通过对嘉庆五年赵文楷、李鼎元赴琉册封活动过程的分析，阐述了此次册封的特点及其在清代中琉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作者指出，在这次册封活动中，赵文楷、李鼎元在遵循向例的基础上，主动减少廪给，谢绝七宴，令员役人等少带货物，对兵丁严加管束等，“稍改旧制”，摒弃陋习，使册封制度和礼仪“益加周详”。可以说，这是承前启后、较为成功的一次册封活动，促进了中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中琉间的友好关系。钦使赵文楷、李鼎元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册封使命，还分别撰写了《槎上存稿》、《使琉球记》等，为中琉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该文从新的角度对清代中琉关系进行了探索和研究，特别是对钦使赵文楷、李鼎元及此次册封活动特点和影响方面的研究颇有新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吴元丰在其论文《新近发现的清代中琉关系满汉文档案及其价值》中，披露了新近发现的清前期顺治和康熙两朝有关中琉关系的满汉文档案的由来和内容。作者认为，新发现的满汉文档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即对清前期中琉两国间请封、册封、进贡、颁赏等活动及其相关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对澄清某些历史事实和深入系统地开展清初中琉关系史的研究，很有益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俞玉储的论文题目是《对清代琉球难船为贸易而漂流之我见》，他以一史馆馆藏档案为依据，对清代乾、嘉、道、咸、同五朝 243 起琉球难船事件进行分类列表，采取排除法进行研究，没有发现一起很明显是“为贸易目的的伪装漂流船”，因为清政府对琉球难船的优惠政策并不能弥补船、货在海上的损失。据此，俞先生认为琉球难船均系无法抗拒大自然的威力所致，确实是遭遇风浪而漂至中国，从而否定了日本学者西里喜行先生提出的“漂到清国的琉球船有不少以私人贸易为目的的漂流船”的观点。俞玉储先生的论断引起了与会学者的争议。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办公室主任、副研究馆员杨冬权先生当即提出了不同看法：第一，从明洪武 25 年至雍正末年这 340 多年间，漂至中国的琉球难船事件总计只有几十起，而自乾隆二年发布优恤难船的上谕后，琉球难船事件次数骤然增加，仅乾隆年间就将近 80 起，超过以往 340 多年的总和。如果纯粹由于大自然的威力而无经济利益的驱动，就无法解释乾隆前后琉球难船次数大相径庭这一事实。第二，琉球王国在所颁布的“验船规定”和“禁令”中已明确指出，漂至中国的琉球难船“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做买卖”，因而采取了打击措施。第三，认为俞先生论文的全部根据都是官方的档案，缺乏佐证。俞先生的论断虽有争议，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此次会议研究范围广泛，问题探讨深入，并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会议开得热烈而有序，自始至终充溢着浓厚的学术气氛，可以说，此次会议为中琉历史关系的深入研究又增添了一朵奇葩。

（作者邹爱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刘兰青：中国第一历史档馆馆员。邮编：100031）